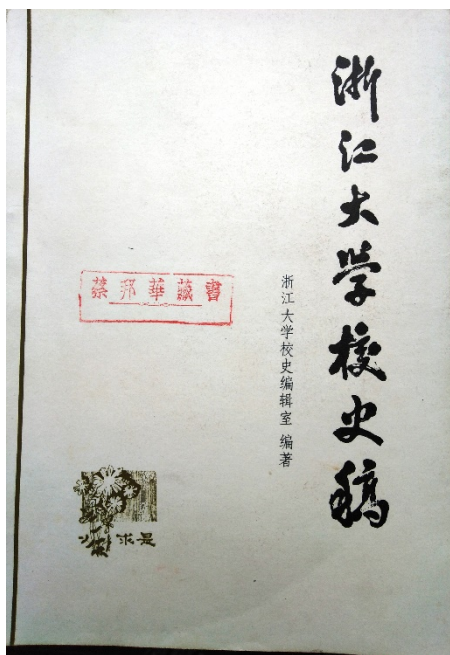


以“求是”精神，正本溯源，李约瑟访问浙大补录

蔡恒胜¹

因新冠肺炎宅在家中半年，使我有时间系统而深入地阅读从 1936 年至 1949 年十三年间竺可桢执掌浙大校长期间的全部日记，写下了竺可桢日记札记初稿（1936-1949）读书笔记。同时对我在 2018 年写过的“探索李约瑟（尼德汉）是否把浙大誉“东方剑桥”原始材料之一至之六”和在浙大西迁宜山办学 80 纪念大会上的发言进行综合，最后整理出版为《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之路》中的一节及附录予以阐述，获得很多人正面的响应；同时也听到一些不同声音，特别是仍有不少网络文章甚至学术著作继续宣扬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之说。促使我思考为什么竺可桢和李约瑟都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的“东方剑桥”，在 1980 年代后却甚嚣尘上、在之前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呢？而现在为何想正本清源的阻力仍然很大？



最近一偶然机会我堂兄在翻阅我家老屋的资料中发现一份浙大校史稿，盖有蔡邦华藏书的红字印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查看后，马上通知我并复制拷贝发我。此稿由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执笔为安康、正棠和打黑框的孙祥治，标注一九八二年春。我记得在该年四月一日是浙大校庆 85 周年，也是家父离开杭州近 30 年后第一次返回母校参加活动，当时还是钱三强兼任校长的尾声²，因我深知他对浙大的复杂情感³，是我反复动员下才来参加的，当时他身体已不好，在我们陪同下来杭的，这份校史稿应在那前后得到的，因为第二年他就乘鹤西归了。有意思的是他认真阅读了全稿，却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日李约瑟到浙大参观后对浙大师生作“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段落下勾画了下划线，予以突出，或是对此有所质疑？⁴ 在我的文章里曾提及在 JN and Zhejiang University（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有关李约瑟（JN）和浙江大学）的

¹ 蔡恒胜 浙大西迁二代退休老人，生于 1943 年西迁时的贵州湄潭，竺可桢日记和浙大西迁史的爱好者。

² 钱三强于 1978.12-1982.06 期间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浙大同属中国科学院管辖。这次校庆由副校长杨士林主持，钱三强没有出席。钱三强与父亲很熟悉，他家与我家是近邻，但没想到他这次却因病缺席。

³ 我父亲 1949 年 4 月 1 日曾与郑晓沧等三人是浙大 22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竺可桢校长离校后被推举为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校务，接受军管。1952 年三反运动被诬陷，被隔离审查，最后查无实据消案处理，上调中国科学院。沙文汉省长后来作了道歉，但身心受到很大影响，以后一直没回过浙大。

⁴ 家父收集有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史》五卷是家中常翻阅和讨论的话题，但我从未听他说过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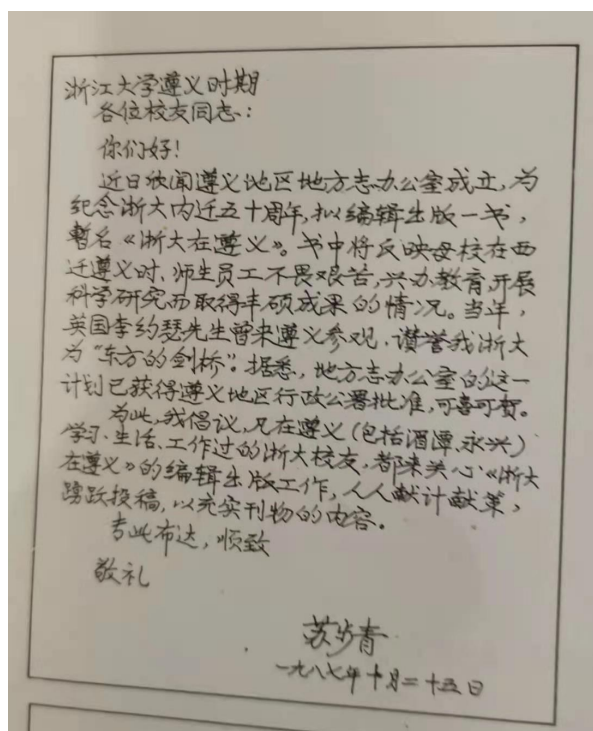
网页上由国内上呈（时间标明为 2017/5/8 上午操作者：John Moffett）的周惠斌《李约瑟两访浙江大学》的文章里提及“4月10日，李约瑟自重庆来到遵义，浙大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为师生作了《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李约瑟在演讲中感怀于浙大浓厚的学术气氛，认为浙大完全可以同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媲美，并且高度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我当时就指出“该文更荒唐地说出是李约瑟第一次访浙大的1944年4月10日，他在《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中提出东方剑桥的下划线的文字，这样提法明显失实，完全没有根据。竺可桢日记中记载，4月10日，李约瑟中午到遵义，马上吃饭，之后就作上面的演讲，第二天就离开遵义了。李约瑟对浙大原来是没有多少概念的，因此不可能一到浙大，在没有参观与交流的情况下，就在演讲中说浙大是东方剑桥。这位写手不知从哪里获得的材料，他看过李约瑟的演讲稿？演讲稿上有“浙大是东方剑桥”的文字？”我也查找“周惠斌”是何人，是否代表浙大校方？未果。现在看来出处就在于浙大校史稿。我请教了浙大的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钱永红，安康、正棠是谁？原来是毛安康和毛正棠两位先生，而孙祥治先生则是竺可桢日记里所注的时任浙大文书室主任。我查到1963年9月13日竺日记曾记载：“浙大寄来《浙江大学校史初稿》第一编二部分，讲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一个时期，正值我长校时期，写得相当详细。”以此为线索，请许高渝老师帮助，希望进一步了解浙大是否有李约瑟的“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稿，两位毛先生是否亲自看过该稿有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文字，可惜两位先生已不在了，但浙大并没查到有该讲演稿。钱永红提供了我1944年〔第27卷第2期，27-35页〕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上刊载的“J. 尼德汉 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文章和1943年〔第3卷第1期，53页〕的《图书月刊》尼德汉抵渝提及他的该讲演稿，以及在李约瑟的《科学前沿》中刊载的“战时和平时之科学合作”译文。文中都没有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文字。而且李约瑟1943年3月抵达重庆就开始作那个报告，当时的李约瑟对浙大情况一无所知，也不认识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1945年第1期有许多有关李约瑟在浙大的报道。这应是最全，最详细的在遵湄时期有关李约瑟访问浙大的珍贵史料，从郑宗海、吴仿、林等人署名的文字报道中也都没有“东方剑桥”之说。1943年8月10日出版122期浙大校刊，但123期则到了1945年5月10日才出版，其中正好缺了1944年一年多的资料，所以没查到有浙大校刊关于李约瑟两访浙大的报道，而且至今在浙大1946年复员杭州以前，除了查到1944年12月贵州日报“尼德汉教授赞扬我科学家联大浙大不啻牛津剑桥哈佛”的标题和中央社伦敦新闻稿中李约瑟以西南联大和浙大学生的学术水平高，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相比拟的字句外，没有任何东方剑桥的文字。因此，需要追根寻源的是那本1982年浙大校史稿称所谓李约瑟1944年4月10日的“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讲演”。我们就是不知道那本校史稿的作者是在场

的听众，还是听说，或是看过李约瑟的讲演稿，或只是事后含糊作出的推论，该校史稿写法是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而不是直接引语“称赞浙大是东方剑桥”。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查到一张校史初稿的封面上有批注：本件系一九六二年编写的未定稿本内容观点多有谬误。只能作参考，不能作正式根据，如作为材料摘录，仍须核实。我察看了1962年编写的油印稿（如图）第80页，即李约瑟1944年4月10日的“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讲演”的一段话，与1982年的校史稿文字稍有差别是李约瑟称浙大为“东方剑桥”，少了个“赞”字。不知此稿是否是孙祥治所写，并在1963年9月13日寄往北京请竺校长过目的那一份校史稿？在1981年10月还有一份校史征求稿，是该稿修改为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旁边有人的批注的意见“可综合说明中外人的称赞”，再旁是校史稿作者的辩解，因中国人没有称赞浙大，故不列。由此有理由认为是校史作者认为李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更好，并在1982年校史稿得以确认。最近查到这个“周惠斌”开始变调了，现在网上已查不到李约瑟研究所那篇周惠斌的“李约瑟两访浙江大学”的文章，而在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转载的人民政协报2009-06-11的“李约瑟先生两次访问访浙江大学”一篇和另一篇2017年3月21日的人民政协报以“李约瑟先生的中国情结”为题，谈到了李的两访浙大，内容基本相同。对他第一次访问，他这样写道：“1944年4月10日，李约瑟自重庆来到遵义，对浙江大学进行考察访问，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为师生作了《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李约瑟的精彩演讲不仅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声音，鼓舞了浙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而且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并非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晚上还与师生进行了友好交流。”他的“李约瑟在演讲中感怀于浙大浓厚的学术气氛，认为浙大完全可以同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媲美，并且高度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词句不见了。对第二次访问浙大，又作了不同的表述，但改说“李约瑟两次访问考察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声名远播、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没再提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那段话了？既然作者改变了观点，说明“东方剑桥”不是出自李约瑟之口，那为何不通知李约瑟研究所 John Moffett 馆长更改在李约瑟（JN）和浙江大学网站上同一篇文章的内容呢？

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现收集到的有关校方浙大校史资料有四个版本：《浙江大学在遵义》（1990年）、《浙江大学校史 上卷·修改稿》（1992年）、《求是园沧桑 浙江大学简史》（征求意见稿三稿 1994年）、《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1996年）。对于“东方剑桥”之说有着略有不同的表述。还有两本编辑的竺可桢传，其一为浙大毛正棠执笔的《竺可桢传》（上册）（1982年），有“东

方剑桥”文字。王国松序言也有，但王没提“李约瑟称”几个字，而毛正棠说到了李约瑟的《战时与平时…》演讲时，同时说：“曾称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这与张其昀在1947年校庆特刊——“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的说法“称之为东方的剑桥”相近，看来毛正棠用“同时说：曾称赞”引用了张其昀文章的说法，而本人在前述文章中已指出，张其昀先生在李约瑟1944年访问浙大时，他在美国进修讲学，没有参与接待。因此他的说法似乎来源还是中央社伦敦十四日（1944）报道：返英之尼德汉教授应“中国大学委员会”之请所发表的演说的衍生，以及后来（1967年）他在提及李约瑟同一段话时用了“中国的剑桥”与“东方的剑桥”不同的提法，应该更严谨了些，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1990年科学出版社的《竺可桢传》里没有“东方剑桥”之说，该传记（上篇）的第四章“肩担浙大重任，危难中颠沛西迁”（许国华执笔）有如下文字：“……浙江大学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也大有提高和进步。当时浙江大学的数学系和生物系在全国有很高声誉，物理系、化工系、化学系、史地系和电机工程系等也很有名。浙大的学生在学业竞赛和公费留学生选拔中常常名列前茅，浙大的教授在科研成果评奖中得奖名额和中央研究院担任评议员名额也处于各大学前列。当时物理系王淦昌教授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刊于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61卷97期1942），在国际学术界有划时代意义；另外王淦昌关于分子轨道和杂化的研究，生物系贝时璋教授关于实验生物的研究，谈家桢教授关于基因遗传的研究，罗宗洛教授关于微量元素和生长素对植物生长关系的研究，蔡邦华关于昆虫分类学的研究，数学系苏步青教授关于射影微分几何和仿射微分几何的研究，陈建功教授关于三角级数论和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史地系张荫麟教授所著《中国史纲》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结果，浙江大学的声誉日隆，成为全国少数最好大学之一。1944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在考察中国许多大学之后，说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又说中国的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可以和西方的牛津、剑桥、哈佛媲美。尽管浙江大学的进步在竺可桢接任的前四年内就已开始，那时因为忙于搬迁动荡不安，进展较慢：大部分的进展，是在贵州六年半中取得的。”该段标注是参考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浙江大学校史稿》浙江大学1982年印等材料，但偏偏删除了李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一句。说明竺可桢研究的部分学者包括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等人并不认同李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说法有足够的证据。我在上次的文章里曾提及苏步青和谈家桢在纪念竺可桢百年诞辰时的文章里有类似说法，特别是由苏先生口述，再由校友杨竹亭记录整理成文的《怀念竺可桢先生》中说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但这与1982年浙大校史稿说是李约瑟在1944年4月10日第一次访问遵义时讲的显然矛盾，竺可桢4月10日日记：“三点请李约瑟讲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in Peace & War 和平与战争中的国际科学合作。谈一小时余，至四点半散会，由劲夫陪同，参观工学院实验室。六点半在教职员

俱乐部晚〔膳〕，到迪生、劲夫、苓谋、洽周、振公、直侯、尊生、坤珊、俶南、羽仪、钟韩、耀德、馥初、乔年及曹君（梁厦之公子）。膳后请李约瑟谈话，述其来中国后工作之经过。……”4月11日“七点至社会服务处送李约瑟赴贵阳，到苓谋、劲夫与洽周。……”没有提到浙大湄潭方面有人参加，李约瑟在10月25日在第二次到湄潭的浙大访问，使他对浙大的科研活动有深刻印象，因而回到伦敦后的发言才给予浙大高度赞扬。而浙大校史稿里并没有提及在该期间李约瑟有再次称赞浙大为“东



方剑桥”的话。实际上苏先生在1987年10月25日有亲笔写给遵义浙大校友的信一封，信中他提及“当年，英国李约瑟先生曾来遵义参观，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的话。这说明他是认同了校史稿中的说法。苏伯伯是我熟悉的长辈，他与家父同年，属虎，都曾在日本留学，在浙大

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而在同一年的1987年，我出国归来曾到上海复旦九宿舍拜访过他，当时他85岁高龄，虽然夫人去世对他有所影响，但思路清楚，身体可以，这封信应是他写的，没错。因我和他通过信，他曾为我出国写过教授推荐信，我认识他的字。在拨乱反正的年代，我完全理解老一辈浙大人包括家父用东方剑桥来比喻竺可桢执掌浙大十三年的辉煌历史，从而肯定竺可桢校长的巨大功绩。因为政权交接后，浙大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嫡系学校，竺可桢离校后，浙大被军管，他在写给王国松、蔡邦华、谭天锡常委的信中，甚至表示“一俟军管会对于接收浙大办法定后，弟自必返校交代”的字句。院系调整后浙大被拆分，成了工科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老浙大人甚至不愿触及浙大过去的历史，直至80年代才开始改变。但竺可桢制定浙大校训是“求是”，李约瑟称赞过浙大，但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却没有文字依据，校史作者在没有对“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讲演稿的核实下，含糊地作出的推论，是不足信的，不求是的。至于后来一些文章为了取证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作进一步发挥想象，甚至有浙大校长写文说“李约瑟在‘自然’周刊上赞誉浙大是

‘东方的剑桥’”⁵ 则是更不应该了。现在很多浙大人已不再提李约瑟称赞浙大是“东方剑桥”了，但社会上流毒太深、太广，我作为旁观者表达的只是个人意见，既然误传首先出自于浙大校史出版物，建议浙大以“求是”精神，正本溯源，修订正确的浙大校史，祛除过去不实传闻和不确结论，以使真史流传，杜绝社会舆论的以讹传讹，使“求是”精神发扬光大，永垂史册。（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

⁵ 查见“生物学人仰泰斗，求是师生颂寿星”的文章。